

日美关税谈判拖而未决

自4月份美国新一届政府启动无差别加征关税措施以来，日本成为最先与美国政府取得联系并实现谈判的国家之一。但如今经过近3个月的七轮部长级会谈和一次首脑间直接对话，日本没有成为美国最初希望塑造成的“谈判标杆”，日美关税谈判的未来仍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由于美国政府加征关税措施对日本钢铁、汽车等支柱产业将构成“毁灭性打击”，日本政府自谈判伊始就将免除全部关税措施作为最终目标。然而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参与的日美第一轮关税谈判达成“方向性共识”之后，双方再没能弥合在谈判前提上的“错位”。日本政府的策略是不断细化对美合作一揽子方案，包括扩大贸易规模缩小逆差、消除非关税壁垒等。但美国方面始终不肯对汽车关税松口，认为这并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此外，在日本谈判团队看来，谈判过程中，和美财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的“三核”机制对接难以找到发力点，谈判流程混乱。此外，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总统手中，部长级谈判成果向上传导的效果和效率存疑。不仅如此，伴随美国与多国谈判的推进，日本发现自己早已不是美国的优先对象，谈判进程从第一梯队被远远甩开，这也让其费尽心思为美国准备的经济安保“大礼包”处于尴尬地位。种种结构性因素交织叠加，让日美关税谈判陷入了越拖越复杂的困境。

日本政府此前的目标是，在6月中旬加拿大G7峰会前达成部长级共识，并在峰会期间实现日美首脑会谈，届时宣布谈判成果，并将此作为即将到来的7月份参议院选举前的重要政绩。但事实证明，由于前序工作远未成型，日美首脑会谈对于加征关税问题仅仅一带而过，并没能达成此前日本社会所期待达成的首脑共识，日本首相石破茂无奈失去了参议院选举前最重要的政绩展示机会之一。在首脑会谈结束后，日本经济再生大臣、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赤泽亮正在接受采访时作出了日美关税谈判前景“一片迷雾”的评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作出类似表态，足见多轮谈判以及首脑会谈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使其信心倍受打击。

6月26日起，赤泽亮正再次访美，与美方展开第七轮部长级关税谈判。赤泽亮正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了会面和电话会谈，为了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面，赤泽亮正还特意延长了在美逗留时间。但意外的是，直至离开华盛顿，赤泽亮正都未能见到贝森特一面，双方此轮谈判再次无果而终。据日本媒体报道，赤泽亮正的访美行动属于“突袭式”，多数情况下他从日本羽田机场起飞时，都还没确定与美方的谈判时间表。他自称每次都能实现部长级会面，因此“访问成功率高达100%”。但显然在第七轮谈判中，由于没有提前做好“功课”，导致没能与关键人物会面，赤泽亮正的“突袭”似乎遭遇了滑铁卢。



日本媒体和专家认为，美国对进口汽车产品加征25%关税对日本经济影响巨大。汽车是日本的核心产业，2024年日本输美汽车约137万辆，包括零部件在内的出口额共计7.2万亿日元，占日本对美出口的34%。随着7月9日的美国对等关税暂停期将至，日美之间的关税谈判开始出现夜长梦多的情况。经过近3个月的拉锯战，日本的表现不仅没让美国政府满意，反而让其失去了耐心。美方近日表示，没必要延长对等关税暂停期，表示将在7月9日之前向各国发函明确税率情况。其中点名日本称“比如这封函可以发给日本，亲爱的日本，你们的汽车将面临25%的关税”。美方还强调，日美之间汽车贸易存在不公平，日本出口大量汽车到美国，却不肯进口美国车，要求日本消除两国间贸易逆差，具体途径是“可大量购买石油，或者很多其他东西”。有分析认为，这足以证明一段时间以来的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提出的一揽子合作计划并没能让美国政府感受到足够的诚意。

此外，美方还一度戳到日本近期的“痛点”大米问题，特朗普6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尽管日本面临严重的大米短缺，仍不愿进口美国大米，这代表各国对美国的态度“骄横”。有观点认为，这是美方进一步给日本加征关税的“威胁”。针对美国政府这一表态，赤泽亮正回应称，“我们不会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进行谈判，这一理念没有

改变”。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也表示日本不会在贸易谈判中牺牲农业部门利益。事实上，围绕农产品进口是否扩大、如何扩大等问题，日本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早在谈判伊始，就有声音认为应该扩大进口美国产大米，以解决日本国内粮食短缺问题，但自民党内一众农林系“大佬”坚决反对扩大大米进口，加之参议院选举将近，农户票仓重要性陡增，日本恐难在此时作出扩大进口美国产大米的决定。另外，小泉进次郎临危受命担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后，以扩大储备粮进入市场的规模作为平抑米价的手段，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储备粮也已行将见底，未来是否要加大从国外进口，仍处在争论之中。日本目前的方案是扩大美国玉米、大豆进口，但显然这不能让美国政府满意。此前有日本政府和经济学界人士分析，特朗普要求日本增加美国大米进口，并不是真的出于其直接政治利益考量，因为大米主要种植地区不属于其重点票仓范

围，此举的主要目的就是展现能够让日本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能力，从而起到对他国施压的示范效应。

经过持续近3个月的七轮部长级谈判和一次首脑会谈，结合美国政府近期涉日表态看，日美关税谈判似乎不仅没能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前进，反而是分歧愈加明显，矛盾愈加尖锐。日本参议院选举将近，未能在对美关税谈判中取得成果的石破茂政权，恐将面对社会民众的质疑以及来自在野党的“狂轰滥炸”。此外，在此前被视作参议院选前站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上，自民党受“黑金政治”影响遭遇史上最惨败，给参议院选举“泼了冷水”。在“令和米荒”尚未平息、物价上涨仍在持续、工资增长进度缓慢、“黑金政治”影响仍未消退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又在关税谈判问题上面临来自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未来日美关税谈判进展将如何影响日美关系和参议院选举结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能源合作不断深化，相关领域交往日益密切。一个由东盟及各成员国的能源政策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日前到访中国。期间，代表团参加了东盟低碳能源投资路径研讨会，并赴一些研究机构、大学及企业进行参观。

作为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东盟能源中心执行董事阿卜杜勒·拉齐布·达伍德对此次中国之行倍感兴奋，也对中国与东盟的能源合作前景充满期待。7月1日，他在北京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中国有句俗话——眼见为实。尽管我知道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水平全球领先，但是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依然让我大开眼界。我更加确信中国的经验、技术和投资将帮助东盟实现能源转型目标。”初见记者，达伍德难掩兴奋之情。

近年来，东盟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需求持续上升。然而，近半数东盟成员国尚未实现全面电气化，能源短缺和供应不稳定问题突出。达伍德坦言，东盟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各成员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协调区域内部政策，实现标准统一，是推动地区能源转型的一大难题。同时，东盟还面临资金短缺、技术储备不足等挑战。

达伍德表示，中国不仅具备领先的技术能力，更拥有系统性、前瞻性的能源转型战略，这对东盟国家具有极强的示范和借鉴意义。东盟各国普遍高度认可中国的能源转型成果，并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和技术输出表示欢迎。

“实现能源转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策、资金和区域协同的系统工程。东盟迫切需要更多外部支持，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在能源转型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能够在政策制定、产业协同、技术支持以及金融服务等多个层面提供全方位的帮助。”达伍德说。

当前，许多中国企业正在东盟布局清洁能源、新能源交通及数字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业务，并通过与东盟本地制造业深度对接，不断拓展在下游产业链的布局。

“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业务本地化进程正在加速。这不仅推动了东盟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也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产业升级。中国企业的这种投资模式，不仅是单纯的资本输入，更带来了技术转移、产业升级和能力建设，极大提升了东盟国家自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达伍德说。

据达伍德介绍，东盟能源中心正在制定下一阶段的五年计划——《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2026—2030》。该计划以“推进区域合作，确保能源安全，加速脱碳，实现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为核心目标。达伍德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东盟不仅需要在政策层面加强协同，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前沿技术的支持。在这方面，中国无疑是东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东盟需要不断推进与中国的合作。

“这次代表团受邀来到中国参观考察，对双边的能源合作至关重要。”达伍德表示，他期待未来再次到访中国，推动东盟与中国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更加深入。

印度央行释放宽松信号安抚市场

本报记者 施普皓

近期，印度储备银行（央行）行长桑贾伊·马尔霍特拉表示，若通胀数据持续低于预期，央行可能进一步降息。马尔霍特拉强调，政府部门将保持“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在经济增长与通胀控制间寻求精准平衡。马尔霍特拉这一表态，无疑是在回应近期市场对印度货币政策的关注。

6月初，印度央行的核心决策部门——货币政策委员会意外将回购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5.5%，远超市场预计的25个基点，同时将政策立场从“宽松”调整为“中性”，引发本轮降息周期临近尾声的猜测。政策转向引发市场波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恐慌，投资者担忧融资环境可能趋紧。

此前，印度货币政策委员会指出，连续3次会议累计降息100个基点后，“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正在收窄”，货币政策“支持增长的能力已非常有限”。而在近期的访谈中，马尔霍特拉则转而释放乐观信号，表示“通胀前景持续优于我们当前预测，将为政策调整创造空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央行官方作出此类表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市场情绪，避免投资者因印度货币政策的风向转变而过度紧张。

印度央行声明显示，该国今年的通胀预期已从此前的4%下调至3.7%。同时，受食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印度4月份总体通胀率降至3.2%，为近6年来最低，远低于央行4%的中期目标，为政策提供了宽裕空间。根据印度信用评级公司CareEdge的最新报告，印度经济2024/2025财年第四季度（2025年1月至2025年3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推动全年增速达6.5%，超出市场预期。尽管该增速较前两年8.4%的平均水平有所放缓，但仍旧体现出印度较为稳固的

经济基础。具体数据上，建筑业第四季度猛增10.8%，处于领跑地位。制造业有明显改善，产能利用率回升至75%以上。同时，服务业也持续发力，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主引擎地位。此外，报告还给出预测，认为2025/2026财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6.2%。

这种情况下，通胀水平尚在可控范围，印度央行按理来说无需急于收紧货币政策。之所以作出此番决策，是因为印度央行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面对的问题较多，隐患也不少，不得不进行风险管控，收紧各方政策。以印度央行为例，其当前面临着不良贷款激增、资本外流压力加大等具体问题，即便通胀的压力不大，这些问题也足以让央行警惕，不进行政策调整则可能为国家经济“埋雷”。

更重要的是，即便通胀数据目前来看尚可，但是印度民间的总体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与宏观数据并不完全匹配。印度权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印度全国失业率升至5.6%，较4月的5.1%上升0.5个百分点，创2024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青年失业有所加剧，15岁至24岁群体失业率达18.3%，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其中女性就业情况出现恶化，女性劳动参与率降至19.7%，明显低于前值21.5%。分析人士警告，城市消费信心持续处于悲观区间，负债消费模式正削弱经济抗风险能力。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已突破43%，创历史峰值。

这些数据既暴露出印度经济的短期痛点，也暗含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矛盾，盲目“放水”已很难大幅提振消费，因为消费动力不足是印度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对

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企业垄断格局是当前印度发展的一个长期隐患。印度储备银行（RBI）前副行长维拉尔·阿查里亚表示，自2016年以来，印度国内五大财团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张，印度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帮助上述财团在国内持续做大，不断巩固龙头地位，导致这些企业海外拓展意愿不强，对内创新动力也不足，它们在供给端层面上，无论是价格还是产品质量都难以让消费者满意，很容易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普通民众既面临高额商品溢价，又需承担高额消费税。与此同时，有意进入印度市场的境

外企业也被政策不确定性所困扰。进入印度市场的德国大众、韩国三星皆曾面临过饱含争议的高额罚单，此类事件传递的信号令人对印度营商环境感到不安，阻碍了外来产品为印度消费市场注入新鲜血液的步伐，进一步导致消费者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从这一点看，印度的货币政策或松或紧并非核心因素，印度民众能不能、愿不愿意在国内市场掏钱消费才是重点。印度必须减少保护主义，大力开放市场并激活良性竞争，才能逐步提振国内消费，给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当地时间6月28日拍摄的印度加尔各答街景。

（视觉中国）

本版编辑 周明阳 美编 吴迪

